

怀念我爱智的挚友陈修斋兄

王 太 庆

每当好朋友去世的时刻,今生不能再见,回忆往日相处的欢乐,人总是悲痛的。修斋兄去世,我深有此感。但是这不只于悲痛,回忆起来,感到恬静的成分很多,是我回忆故去的亲人时所没有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友谊主要是哲学思想的友谊,不是什么别的。我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哲学家,但是我们喜爱哲学,而且以后还爱。我们俩都是这样,也意识到彼此都这样想,所以成了朋友。他去了,不会变得不爱哲学了,所以我感到恬静。他对于不爱哲学的事是嫉恶如仇的,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体会得到他的怒实是对真理的爱,现在他决不会改变这种态度了,所以我非常放心,感到恬静。

他是比我早两年毕业的学长,原来是学外交的,却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前程从重庆跑到昆明来搞哲学。这只是因为他爱哲学。我原来没有想什么别的出路就选择了哲学,不如他从别的道路上经过思考终于转到哲学上。他来听陈康先生的课,听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读柏拉图的书。我们发现从苏格拉底起,有一个新的趋向:过去的大师们不满足于博闻强记,要求取得更深的真知灼见,即所谓 *sophia* (智慧),苏格拉底继承了这传统。但是过去的大师们取得了一点这样的智慧就号称哲人(*Sophos*),直到炫耀这样的智慧、卖弄聪明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程度,成了所谓智慧的人即智者(*sophistes*)。这种智者的智术(*sophisma*)为苏格拉底所不取,也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不取。智者以为个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样,个人的纷歧意见就取代了共同的知识,意见莫衷一是,就谈不上什么真理。智者不要客观真理但求取胜,正是走到智慧的反面。智者卖弄智术的作风就是自以为是,其实不是爱智慧。苏格拉底要当智慧的爱好者(*philosophos*),即热爱智慧,终身努力探讨,有错就改,由浅入深,以至无穷。爱智者不是一个一个的独夫,只是充当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我在学哲学之初,原本是愿意成为哲人拥有智慧的,这也是哲学界的一般情况。不过从开始我并没有压倒别人的野心,只希望知道得深刻一点。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我比较顺利地理解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爱智者观点。我不再希望成为哲人,只想不断地研究哲学。对创立体系的哲学家我只钦佩他们的学问,并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后来跟修斋兄熟了,谈起这方面的想法,才知道他早有这个意思,正是为了当一个爱智者才不走已经进了门的外交官道路的,也正是为了不当空头哲人才心甘情愿地从事翻译哲学名著的事业的。后来到了北京,我也走了这条道路,就是学了他的样。所以后来遇到有些人看不起翻译,或者看到有些人看不起哲学史研究,我还是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修斋兄远在武汉,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用不着串联。

哲学家这个名词不是我国固有的,是从日本输入的 *philosophos* 的译名。我国固有的只有哲人圣人这个词,大致相当于希腊的 *sophos*,与 *philosophos* 之为爱智者不同。所以严格说来,中国至今还没有 *philosophos* 的观念,一般说“哲学家”时指的要末是看相算命先生,要末是那些自命

绝对正确的天生圣人，如文武周公孔子。文武周公孔子当然有他们杰出的智慧，是智慧的人，却不能说是爱智慧的人。由于这样一些人物被称为哲人或圣人，而圣人又是皇帝，哲人的意思就带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之意了。哲学家虽然是 *philosophos* 的译名，实际上却被了解成 *sophos*，而不是爱智者。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 50 年代院系调整后向苏联学习制定各系教学大纲时，引进莫斯科大学的大纲，上面写着哲学系的培养目标为 *philosoph*，译为“哲学家”。这三个字在我国令人吃惊，因为人们觉得哲学系的毕业生离“哲学家”太远了。因此“哲学家”这三个字在我们大纲里被改成了“哲学工作者”这个新撰的名称，据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是哲学家。

这不是一个译名问题，而是哲学思想的不同。修斋兄和我认为，哲学系培养学生成为爱智者，即笃爱真理而谦虚好学终身不懈的人，是非常之对的，不同于造就一些某类的技术人才，即所谓“工作者”。人类从有知识进而认识到全面的、概括的真知灼见，即智慧，是一大进步。但是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到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地将一个侧面、一个段落夸大为全体的地步，走到智慧的反面。苏格拉底从这个反面认清了自己，不再自负为拥有智慧而全心全意地热爱智慧，乃是进入更高的阶段。这是第二个大进步。修斋兄和我以此为出发点，也希望治哲学的人都以此为出发点，但是我们遇到的并不是人人如此。外国人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鲜明的爱智者作典型，在他们的影响下有很多人是爱智的，但也有许多人，许多在他们之后的人，自以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绝对真理。在中国，有明智、谦逊的高明之士，却缺少苏格拉底类型的爱智者，因此哲学家在相当多的人心里并不是爱智者。我们觉得中国哲学要前进一步，实在有必要学习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这个转变，以为借鉴。因此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

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学哲学史就是学哲学，而且学哲学不能不学哲学史，因为我们是爱智者，不想当哲学大师。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跟不少的人不一样。首先，他们认为哲学史家不是哲学家，只是讲讲陈闻旧事，与修齐治平无关，与天人之道无涉。他们听说要学点哲学史，就解释道：经典作家的教导里说到了亚里士多德，还说到了黑格尔，要学点这方面的知识才能了解经典作家的用意。在他们看来，经典作家是天生的圣人，引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话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是在“六经注我”。而在我们看来，任何哲学家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是历史中的一个环节，他的思想是前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要发展为后人的思想。哲学思想并不是孤立的，是发展着的活东西，有它的过去和未来；过去的东西并不是死掉了，而是通过批判、扬弃其消极的方面发扬其积极方面，提高到新的阶段，走向未来。只有从这个发展中才能真正认识哲学，了解某个哲学思想的活的意义，不如此就只见到死板的东西。看不到过去就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未来的人能是智慧的吗？以为自己是天生圣人，或者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是认为自己没有过去，当然不会有未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世界上有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观之后出现，只能是智慧的反面。

一个热爱智慧的人认为哲学有无穷无限的前途，当然不能容忍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把这个美好的前途断送，当然要起来与它抗争。修斋兄就是这样的爱智者。他宣称德国古典唯心论里有好东西，认为我们不能把它丢掉，一定要吸收过来。这好东西就是辩证法，就是发展的哲学史观。发展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里也有，但是决没有德国哲学中、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那样鲜明，正象爱智的观点在中国哲学思想中不如希腊思想中、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中那样鲜明一样。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了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象他那样义正辞严地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

我和修斋兄的哲学思想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上面说的两点,即爱智和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思想,是他甘冒风险捍卫的。他做得对,他的思想永远存在于我国哲学的发展中,而不必标上他的可见的姓氏。他要吸取外国的好东西,决不是贩运外国劣货,而是为我们自己的血肉摄取正好适合的养料,要它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血肉,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任何利益。修斋兄研究西方哲学,是出于爱智,不是出于什么别的考虑。为了掌握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他研究哲学的发展线索和规律,即哲学史。怎样学哲学史呢?他不采取通常的方便办法,找别人写的专著或教本一看,把认为对自己口味的字句划下来,用自己的想法把它们联系起来,就算成了一家之言。他爱智慧,因此非追索出事实的真相不可。这真相仅仅保存在哲学家的原著中,舍此别无他法掌握它。细读原著,而且要尽可能细读原文,是我们的信条。我们不但自己这样做,也希望大家一同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我国学者学习西方哲学 100 年来还只是得到初步的认识,必须加深、提高。为了加深和提高,有必要从事翻译,所以我们选择了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为自己的终身任务。这是我们的老师贺麟先生引导我们上路的,他启发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并且手把手地训练了我们。我们为哲学而翻译,所以立足在研究上,以研究推动翻译,而不是为翻译而翻译,照猫画虎。

我国的哲学翻译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初级发展到高级。早期的译本起了筚路蓝缕的开山作用,但是必须提高,提高的关键在于通过研究加深认识。这一点佛经的翻译经验早已表明,严复以来的现代翻译经验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的任务不仅在补缺,更重要的是提高。社会上有些人以为有了一个译本就够,其实重要的名著需要经过多次翻译,一次一次提高,才能真正地介绍到中国而免除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修斋兄和我常常谈到深夜。陈康先生翻译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的经验和他总结出来的哲学翻译理论给我们重要的启发,他的教导使我们免于在沼泽中爬行,能从高处出发。这出发点就是:掌握哲学问题,抓住论证,而不是糊里糊涂地得出主观的结论;为此,要尽可能地从作者的原文来研究,不以某某译文为根据,但应参考前人的译文,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

修斋兄主要翻译法文著作,就是根据原文研究和翻译,而不是根据某书的法文译文。例如罗班的《希腊思想》和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就是如此。前书是一部哲学史著作,讲述全部希腊哲学,为了理解和评述它,是需要通晓希腊历史和希腊文化的各方面的,修斋兄为此作了大量努力,而不是照原书的文字逐句照描,象过去的某些译者那样。后一部书是重要的经典著作,过去我国学者很少注意过,提到它时基本上是按外国的哲学史课本讲,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因此莱布尼茨的哲学在我国属于缺门,我们相约来攻这个堡垒。我选了他的总结性的短篇《单子论》,修斋兄选了他的论战性长篇《新论》。我们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为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我们是生疏的,也找不到一位专家指引,只有各自钻研,两个人切磋。莱布尼茨使用法文,由于他是德国人使用外国语,不能不规规矩矩,文字上的困难不算大,但是所用哲学术语别具一格,不是一般用语的常见意义,译名煞费斟酌。

译名问题有不少人以为只是统一问题,不统一的译名容易造成误解,把它们比较一下,选定比较好的代替比较差的就行了。我们的体会远非如此,不同的译名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有小错的,有大错的。它们有质的不同,不是主观上认为好不好的问题,决不能用陪审员投票的办法决定取舍,而是一个科学问题。例如柏拉图的 idea 或 eidos 过去照英文的 idea 译成“观念”是大错,照黑格尔的 Idee 译成“理念”也不对,只是比“观念”不对的程度小一点。一位译者如果只识英文而且对哲学史不作研究,只凭个人好恶来判断,是断然不能识别是非,只能以讹传讹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努力下工夫。

修斋兄首先发现,莱布尼茨的书名中就包含着一个问题:他所谓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是仿照洛克的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题名的,他所谓 entendement 就是洛克说的 understanding. 这 understanding 是指什么? 洛克的 book 我国过去有过两个译本,较后的一个译为“理解”,较前的一个译为“悟性”。这两个译名似乎都能懂,过去的读者并未提出什么问题,可是他们把它到底了解成什么呢? understanding 这个字是动词 understand 的现在分词形式,用作名词可以指(1)理解、领悟,(2)理解力,(3)谅解。法文 entendement 也有这三个意义。显然,第二位译者把它了解成第一种意义,第一位译者把它了解成第二种意义。他们到底谁对? 我们细读洛克和莱布尼茨的书,发现这字是经院哲学中 intellectus 的译语,指的是英法文的 intellect,即理解的能力。所以第一位译者译为“悟性”基本上是对的,过去口语说的悟性(如“这小孩悟性好”),就是指理解的能力。但是这个“悟”字过去用来直指“领悟”,符合“理解”的意思,今天大都当“觉悟”讲了,读起来令人感到带豁然贯通的顿悟意味,不完全相当于“理解”。至于第二位译者译为“理解”,的确纠正了“悟”字的顿悟意味,是一个进步,但是丢了“性”所指的“能力,与“理解力”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译“理解”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由于缺少研究,既没有研究学说本身,也没有研究哲学问题的历史发展。如果追寻线索上联到经院哲学,或者往下联到德国哲学,就不会犯那个错误。当时我提出这个 understanding 就是后来康德的 Verstand(英文也译作 understanding),修斋兄认为正确,于是决定改译“理智”。后来庞景仁先生在康德《导论》一书的译本中也采取这个译法。贺麟先生在翻译黑格尔时另铸新名“知性”译 Verstand,也是联系到斯宾诺莎的 intellectus,着意于理解力的。

我们讨论这个译名,实际上是讨论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那时我们还不到 30 岁,满心爱智,没有杂念。后来遭遇到坎坷,从生活上说的确是不便的,但是我们即使在那时也没有因此认为爱智是错的;今天我们分别了,回想当年,我觉得那是幸福的日子。我们永远在一起。

(责任编辑 彭昌林)

(接第 56 页)

有限性是人的本质特性。老黑格尔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断然宣布: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但是,有限性并非人的唯一特性,一个真正的人当是一个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合体,当是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赋予自己的有限存在以永恒意义的人,一个能“在世上留下时间无法消灭的若干痕迹”的人,一个“死而不亡”的人。陈修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肉体虽然由于自然的必然性不可避免地死灭了,但他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还在。他的不死的精神产品将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继续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奋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唁电中有这么一句话:“陈修斋同志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必将会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起推动作用。”历史将会证明,无论在何种意义下,这句话都是一个真命题。

注 释:

① 马克思:《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责任编辑 彭昌林)